

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大课堂

LINGDAOGANBULILUNXUEXIDAKETANG

HONGGUOGONGCHANDANGLISHI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柳建辉

谢春涛

曹普

主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

十八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

十八大以来

HONGGUOGONGCHANDANGLISHI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柳建辉

谢春涛

曹普

主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

十八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龙炜君
封面设计 李法明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历史十八讲/柳建辉等著. —北京: 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 2007. 4

(“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大课堂”系列丛书)

ISBN 978-7-5035-3680-9

I. 中… II. 柳…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干部教育—
学习参考资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2807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装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48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第一讲	陈独秀的历史功过/祝彦	1
第二讲	王明再认识/刘晶芳	24
第三讲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和确立/李东朗	40
第四讲	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刘晶芳	53
第五讲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李东朗	71
第六讲	中共党史上的张闻天/刘宝东	82
第七讲	高岗饶漱石事件述评/陈雪薇	101
第八讲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陈雪薇	116
第九讲	“三面红旗”及其经验教训/谢春涛	124
第十讲	1959年庐山会议的历史教训/郭德宏	134
第十一讲	邓小平与1975年的全面整顿/柳建辉	153
第十二讲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陈雪薇	164
第十三讲	胡耀邦与拨乱反正/陈述	178
第十四讲	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由来和发展/曹普	196
第十五讲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程/谢春涛	219
第十六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演变/李 媛	229
第十七讲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郭德宏	249
第十八讲	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述评/罗平汉	264
后 记		281

第一讲

陈独秀的历史功过

■ 祝 彦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物，具有初步历史知识的人，可能对他都不陌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前我们从传统历史教科书中认识的陈独秀，就是一个反面人物，比如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甚至“反革命”、“叛徒”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陈独秀问题有了宽松气氛，对于过去一些问题敢于解放思想，进行拨乱反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真实的陈独秀。

一 家世与少年时期

之所以要讲一讲陈独秀的家世与早年生活，是考虑一般读者可能对陈独秀这方面的情况实际了解不多。同时我觉得，陈独秀的家庭背景和他的早年生活对其性格的养成以至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最后又成为“终身反对派”即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有很大关系，所以对于他的家世和早年生活有必要了解。

（一）出生于“小户人家”

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古代怀宁县）。兄弟姐妹4人，他排行第四，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陈独秀在他的《实庵自传》中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小户人家”。他的父亲是一个秀才，以教书为生。1881年10月7日在苏州教书时病逝，当时陈独秀还不满两周岁。“独秀”这个名字是他在1914年11月发表文章时开始使用的，其意源于安庆市郊区的“独秀山”。他采用“独秀”这个名字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后，好朋友汪孟邹就曾对他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优秀的，即说他的名字中有“一枝独秀”之意。陈独秀忙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家乡附近有一座山，叫独秀山，我是山下一个老百姓，故取其意。虽然如此，但这无意的取名，却很形象地概括了陈独秀喜欢独立思考、特立独行、不肯服输、固执坚毅的性格。1953年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乘军

舰经过安庆接见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时，曾问起陈独秀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先有独秀山，还是先有陈独秀。傅大章回答说，是先有独秀山。毛泽东还问起陈独秀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傅大章回答说，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一家在安庆，生活很艰苦，毛泽东就说了一句：生活还是要照顾嘛！于是当地政府每月给陈松年一家30元的生活补贴。由于这一特殊背景，还使陈松年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遭迫害。

陈独秀的叔父是个官运亨通的人物，中过举人，做过知县，不断升迁到知州、知府，做过相当于今天副部级的道员，而且很有经商头脑，在赚了很多钱财并置了大批田产之后，于1908年在看到清朝江山不保的情况下，辞官回到安庆市。这样一来，由于叔父的发迹，陈独秀一家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陈独秀的叔父没有儿子，按照当地的风俗，陈独秀过继给很富有的叔父家做嗣子。但是陈独秀从来没有享受使用过叔父的万贯家财。在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他更是宁可过贫穷艰苦的日子，也没有动用这位嗣父的遗产。

（二）倔犟的性格与少年得志

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有个绰号，叫“白胡爹爹”，是一个非常严厉、脾气有点古怪的老秀才。陈独秀曾这样描述过这位长辈：“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陈独秀从小受到祖父的看重而更加感受到祖父的严厉，据他回忆说：“我从6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女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是一位很能干、热情仗义、性格温顺又缺乏原则的家庭妇女，她常常教育子女“不准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花子”，她和那个时代所有的母亲一样，督促儿子用功读书，走光宗耀祖的路子。母亲的这一性格对陈独秀影响很大，他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

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①

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去世了，于是由哥哥在家教他读书。他的哥哥与祖父的性格相反，非常温厚和气，并不严厉逼迫陈独秀读书。陈独秀非常讨厌八股文和科举考试，只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才用点心思读书。1896年，17岁的陈独秀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参加了院试，考试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出自《孟子·梁惠王》，全句为：“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老丧死无憾也。”）陈独秀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把考卷答完，第一个走出考场。他的哥哥看了陈独秀的稿子，非常失望。但出乎意料的是，发榜的时候，陈独秀居然考得了秀才第一名。对于轻而易举得到的秀才，陈独秀自己并不看重，相反更加厌恶、鄙视科举制度。但是陈家却因此更加有了名气，陈独秀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在安庆引起众人的关注，很多人家都托人来做媒，愿意把女儿嫁给陈独秀。最后是安庆统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嫁给了陈独秀。

高大众（1876—1930），又名高晓岚，为高登科的前妻所生，受后母虐待，是一个没有文化、缠一双小脚的传统女性，年长陈独秀3岁。1897年冬18岁的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婚后生有三个儿子：陈延年（1898—1927）、陈乔年（1902—1928）、陈松年（1910—1990）；两个女儿，都过早病逝了。高晓岚也于1930年去世。

（三）留学日本，投身反帝爱国运动

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陈独秀还于1897年夏天去南京参加了乡试，希望能中个举人。但在这次考试过程中的耳闻目睹，使陈独秀彻底与封建制度决裂，走上了反帝反清、民主爱国的革命道路。对此陈独秀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上下左右摇晃起来，拖长着怪声念他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②

这次考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却激发了陈独秀的革命热情。1901年陈独秀到日本求学，接触了反清思想，并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同志，由此积极参加革

① 《实庵自传》，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418页。

② 《实庵自传》，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命活动，走上了反清爱国的革命道路。

（四）创建岳王会，进行革命活动

1904年陈独秀回国后，约10月间到上海参加了由蔡元培、章士钊、蔡锷等人组织的暗杀团。其间学习制造炸弹，并参与谋划了吴樾袭击清朝政府派往西方国家考察的五大臣，轰动一时。后来陈独秀逐渐认识到搞暗杀活动的消极性质，认为这是“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于是，陈独秀着手创建革命组织，发动广大民众进行革命斗争。在安徽芜湖，他利用安徽公学，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并于1905年创建岳王会，主要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岳王会的成员大部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陈独秀个人却没有加入同盟会，其中原因很复杂。

由于陈独秀与高晓岚之间无论文化修养还是性格、志趣等方面的差异太大，因此夫妻之间关系并不好，经常吵架。陈独秀思想活跃，又到处走动，交友广泛；而高晓岚足不出户，目不识丁，对外界一无所知。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接触了新思想，与姐夫陈独秀很谈得来，最后产生了感情。由于是姐夫与小姨子之间发生这种事，遭到家族的强烈反对，两人只好离开安庆，于1910年到杭州同居。高君曼与陈独秀生有一子陈和年、一女陈子美，陈子美晚年移居美国。高君曼1931年在南京病逝，只活了46岁。

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都督是柏文蔚，但柏不管事，省里事务全由陈独秀掌管。辛亥革命失败，陈独秀被通缉，逃往上海，1914年7月又去了日本。陈独秀前后五次去日本，这是最后一次。

二 关于认识和评价陈独秀的几个重大历史问题

（一）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创立中国共产党

1. 创办《新青年》。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与分别一年多的第二个妻子高君曼团聚。这时陈独秀十分想办一个杂志，认为在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思想革命，他很有信心地说：只要10年、8年的功夫，就会把杂志办得很有影响。在朋友的资助下，1915年9月15日，他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的创办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预示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敲响。它启发了一代新人。毛泽东这样回忆《新青年》对他的影响：“《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特别爱

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①“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②

的确，《新青年》及其掀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抨击，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与喜爱。它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声春雷，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灯塔”的作用。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发生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③它启发并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即使在今天，“民主”与“科学”仍然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柱。

2. 受任北大文科学长。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求贤若渴，到处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到北大来，在仔细翻看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后，当即决定聘任陈为文科学长，月薪300元。此时，陈独秀正好到北京来募集《新青年》杂志的出版资金，他白天四处活动，晚上回来则看戏，睡得晚，起床迟。蔡元培为了请到陈独秀，几乎天天来旅馆看陈独秀，有时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如果论资排辈，蔡元培的学历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位秀才。由此可见蔡元培先生礼贤下士的风度！

陈独秀开始不愿意接受聘请，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把杂志搬到北京来办，这样，陈独秀才答应下来。陈独秀临别上海时对朋友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④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这样，就在陈独秀和《新青年》周围，聚集了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刘半农等。杂志从创办时发行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5000多份。“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⑤可见其影响。

① [美]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8页。

③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

④ 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辑。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0页。

陈独秀在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期间，锐意改革，到处聘请著名学者，胡适就是在陈独秀的敦促下回国到北大做教授的。同时他还大力整顿纪律，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当时正在北大读书，就曾被陈独秀给以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把经常逃课、当时担任总统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成了许德珩，后来弄清楚了陈独秀就取消了对许的处分）。

由于改革得罪了人，尤其是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提倡新思想，遭到了保守势力及军阀政府的威胁，校长蔡元培先生更是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北大校园里的顽固派执意要把陈独秀赶出北大，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919年4月8日，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位被解除。

3.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前夕，朋友们劝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但是陈独秀留了下来，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即担当了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首先，他大量撰写文章，宣传爱国思想。1919年6月8日，由于很多学生被捕入狱，陈独秀撰写《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是：“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篇不满100字的短文，富有哲理，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当时的爱国学生起到很好的鼓舞作用。

其次，陈独秀自己也积极投身于运动中，他和学生们一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当时的他是著名学者，年纪也41岁了，但仍冲在运动的前面。6月10日他亲自到中央公园散发传单，12日晚上又到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传单。由于他穿着一身白色西装，衣服里面塞满了传单，非常显眼，他一出现就引起警察的注意，于是在他散发传单时被捕了。

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他的被捕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和社会轰动。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招来学生商量对策，决定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第二天，北京《晨报》首先披露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纸相继报道，于是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陈独秀出狱的强大舆论活动。北洋政府没有想到逮捕一个陈独秀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而且参与营救的人包括社会各阶层的著名人士。李达当时撰文说：

“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①毛泽东也发表营救陈独秀的文章，高度评价陈独秀“为思想界

① 鹤（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

的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①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和强烈要求下，9月16日下午4时，陈独秀获释，这是他第一次被捕，坐了98天的牢房。这次坐牢使陈独秀的社会声望得到极大的提高。

4.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陈独秀虽然出了监狱，但仍被特务监视。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免受北洋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李大钊亲自赶着马车把陈独秀送往天津。在路上，他们两人就商议“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②。

陈独秀到上海后，于1920年5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建立党组织时，就使用什么名字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认为：“就叫共产党”^③。于是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党纲10余条。8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发起组会议在陈独秀家里召开，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这样，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指导下，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建立共产党组织，如北京（1920年10月）、武汉（1920年8月）、长沙（1920年11月）、广州（1921年春）、济南（1921年春）5个支部相继成立。过去我们的传统教科书里面都说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其实党从一成立就叫共产党。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在1945年时肯定陈独秀：“他创造了党，有功劳”^④，这是我们不应该抹杀和忘记的。如果说共产党的老祖宗是谁，可以说，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5. 从一大到五大党的最高领导人。由于陈独秀在全国知识界的影响以及他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成绩和威望，因此，虽然他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还是被代表们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和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帮助陈炯明办教育，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有的人说，当时选陈独秀为党的领袖是误会或者说是历史的错误，这显然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① 《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② 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1925年5月24、25日。

③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2），第221页。

④ 《红旗》，1981年第14期。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党内同志的催促下,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东省的职务,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每月组织上给他的生活费为30~35元,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开支,他只好拼命给报纸杂志写文章赚稿费。

党的二大继续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局,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蔡和森负责宣传工作。党的三大又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党的四大仍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和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党的五大仍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至此,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由于其在党内的威望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担任了一至五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连续五届连选连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二) 大革命失败与陈独秀的责任

历史学上的大革命通常是指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这段时期。即国共实现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但最后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那么谁应该对这次失败负主要责任呢?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所有历史教科书都把这次失败的责任归罪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或“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于是陈独秀成为一个反面人物,是反革命,是叛徒,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责任进行了大胆探讨,基本上得出结论: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罢了^①。胡乔木在1980年说过:“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这个原则错误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对于组织制度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它要求对国际的各个支部(即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这样做容易产生一种不好的倾向,即由一个远离各国革命实践的国际中心来规定各国革命的道路、方针和政策。而且不管是对是错,作为下级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据包惠僧回忆:

1921年9月份,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谈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俩人发生了激烈争论。马林认为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坚决不同意。争论中,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

^① 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①

但是，后来陈独秀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据包惠僧回忆，直接原因是：10月4日陈独秀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为了保释陈独秀，马林花了很多钱请律师，出了很大的力气，感动了陈独秀。陈独秀是个重感情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有时放弃原则，这是作为政治家的致命弱点。这样，陈独秀终于同意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

由于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共作为其下面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并没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权力，一切由他们说了算，不听话就撤职。共产国际可以随意撤换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甚至直接插手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都是听命于莫斯科，比如与国民党合作、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处理等。因此，大革命失败，怎么可以由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个人负责？就连当时的苏联顾问维经斯基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大的责任。”^②

1922年3月，马林根据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考察，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个建议受到中共党内的普遍反对，陈独秀也坚决抵制，为此还特意写信给共产国际，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但是最后马林拿出共产国际的纪律，作为共产国际下级的中共，就只有服从上级的份了。可以说在共产国际的胁迫下，中共同意了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加入国民党，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合作中，共产国际当时太看重国民党，而看不起中共，有人还错误地认为中共“诞生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因此要求中共处于附属的地位，而不是国共之间平等的合作。

大革命的失败显然与加入共产国际有关，也与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有关，而这些都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说逼迫下进行的。我们知道，共产国际实际上被苏联共产党所操纵，也就是被斯大林个人所操纵。因此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十分“关心”，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1927年专门开会讨论达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胡乔木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坏的，中国革命怎么能靠莫斯科来做决定呢？”^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权力？可以说根本没有，因为共产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③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国际实行的是高度集中制度，一切由他们说了算，不听话就撤职，后来如瞿秋白、李立三等就是因为不听话而被莫斯科撤职，而王明则是因为是莫斯科的亲信，才受到重用。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陈独秀身上。在他们的干预下，陈独秀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从1927年7月12日起，“自此即不视事”。共产国际代表还不允许陈独秀出席1927年“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共产国际这种斯大林式的斗争方式，直接影响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选择，也造成了陈独秀悲剧性的人生结局。

目前为止，官方最权威的观点是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该书采用的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比以前简单地把责任全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过分强调陈独秀个人的责任，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更可喜的是，该书用很大篇幅指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该对大革命失败所负的责任，这在以前也是不可能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出于他们的国家利益，往往牺牲中国革命利益来为苏联服务，所以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排斥、打击，最后是镇压时，都一味地主张退让，迫使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作出妥协。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所谓陈独秀的“三大让步”（国民党二大上选举名额、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不是陈独秀要让步，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逼迫中共让步。

为什么要把责任全部推到陈独秀身上呢？根据张国焘的回忆：瞿秋白和鲍罗廷1927年7月在庐山冷静地分析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那么，中共党内又应让谁来承担责任，即做替罪羊呢？瞿秋白分析认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到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我们无法确定张国焘的回忆是否有误，但瞿秋白很快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赏识却是事实，并在大革命失败后成了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①。

当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也不能说没有责任。但是今天，我们似乎更应该把历史背景讲清楚，也就是说，过去由于宣传教育上过分强调了陈

① 姚金果等：《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独秀的错误，以致今天恐怕还有不少人认为陈独秀是一个“反面人物”，是一个“坏蛋”。事实上，如果说责任，恐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

（三）参加托派运动与被开除党籍的问题

在苏联党内，斯大林（1879—1953）与托洛茨基（1879—1940）进行权力斗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产生分歧，两人在列宁去世前夕就开始争夺继承权。1927年11月7日，苏联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庆祝大会，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突然从队伍里打出了“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标语，并高呼“打倒斯大林”的口号。于是在红场发生了拥护斯大林的群众与拥护托洛茨基的群众之间的冲突。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

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季诺维也夫曾说：“这应当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①在这场权力较量中，托洛茨基败下阵来，被开除党籍，驱逐出苏联，最后流亡到墨西哥，1940年还是被斯大林派特工刺杀了。而追随托洛茨基的人就被称为托派，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内被作为“敌人”遭到残酷镇压。我国在1952年又对托派成员进行了逮捕镇压。

中国托派的渊源是来自莫斯科。当时在红场喊口号打倒斯大林的就有中国留学生，他们认为是斯大林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因而拥护托洛茨基。1927年底，这部分赞同托洛茨基主张的学生被遣送回国，他们于1928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陈独秀正是通过这些人，阅读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主张，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主张原来与托洛茨基是惊人地相同，比如反对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等。而实践证明，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正是没有实行这些主张。因此，陈独秀觉得自己是对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了。于是他对承担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感到不满，而托洛茨基为他辩护所说的话，使他对托洛茨基产生了感激之情；当时李立三推行极左错误，对党内同志没有进行耐心教育，而是采取粗暴的态度，动不动就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使陈独秀产生反感情绪；当时李立三搞城市暴动，推行“左”的错误，使革命遭受惨重损失，陈独秀不同意这样做，因此与李立三产生分歧。这些都使陈独秀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道路。

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二个托派组织，同年12月，该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正式选举了该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由此，陈独秀完成了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到托派组织中央总书记的转变。192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曾致信陈独秀：“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一篇反

^① [日] 对马忠行著，大洪译：《托洛茨基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对反对派的文章。”^① 这个警告式的要求，遭到陈独秀的拒绝。同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入党籍的决议案》，《决议案》列举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八条理由。也许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 1930 年 2 月 8 日电报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来莫斯科参加讨论开除他的党籍的会议。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番“好意”，陈独秀拒绝了！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相反他认为当时的“左”倾中央违反了列宁主义。

当时，在中国有四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战斗社”。互相之间钩心斗角，谁都不服谁，后来在托洛茨基的反复敦促和陈独秀的协调工作下，四派终于达成统一的意见，于 1931 年 5 月 1 日召开统一大会，并选举产生了陈独秀为总书记的托派中央。

对于陈独秀以“反国际、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的罪名被开除出党是否合适，史学界近年来对此已经提出了质疑。^② 本文认为，对于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必须结合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做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很难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如果把陈独秀早期从事托派活动归入“还不是敌我问题”，并认为中共中央在 1936 年把托派定为敌我矛盾时，“陈独秀已经脱离托派了”^③，或者如果把“1931 年陈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领导的中国托派运动”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所以，陈在一生的最后十三年，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④ 认为托派与中共的分歧只是“在理论上互相排斥的，但在实践上，一方在农村，一方在城市斗争，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却是互相配合的（日本学者菊池一隆首倡这个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1928 年 12 月在中国出现的托派和 1929 年陈独秀转向托派的行动，仍属革命阵营内部事件”^④。那么，对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问题就要重新认识与分析。但是如果把陈独秀从事托派运

①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 3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6 页。

② 综合起来，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陈独秀坚持错误，又进行分裂活动，为党纪所不容，理应开除党籍；第二种认为，不应该开除陈独秀出党，党应该容纳不同意见的存在；第三种认为，开除陈独秀是在一种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时候，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事实、背景均未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而且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的决定，所以，开除陈独秀的党籍是不正确的，应该为陈独秀平反；第四种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确是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情况下提出的，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但也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在被开除出党后，虽有过申诉，但是，他后来又另组反对派，在行动上已经同党分裂。陈独秀出狱后，不管有什么原因和理由，他都不愿意再回到党内，所以在组织问题上，没有必要为陈独秀平反。见朱敏彦主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荟萃》，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2 页。

③ 张巨浩：《如何认识开除党籍后的陈独秀》，《求是学刊》1980 年第 4 期。

④ 唐宝林：《陈独秀在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陈独秀研究动态》（17）第 4 页，1999 年 9 月。